

# 青铜与文字的婚礼

——夏商周神话、艺术与思想

QINGTONGYUWENZIDEHUNLI  
XIAZHANGZHOU SHENHUA  
YISHUYUSIXIANG

曲  
枫◎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青铜与文字的婚礼

——夏商周神话、艺术与思想

QINGTONGYUWENZIDEHUNLI  
XIASHANGZHOU SHENHUA  
YISHUYUSIXIANG

曲 枫◎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铜与文字的婚礼:夏商周神话、艺术与思想 / 曲枫  
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9.2  
ISBN 978 - 7 - 207 - 11750 - 2

I. ①青… II. ①曲… III. ①新石器时代—艺术史—研究—中国 IV. ①J12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9262 号

责任编辑:姚虹云

封面设计:佟 玉

青铜与文字的婚礼

——夏商周神话、艺术与思想

曲 枫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11750 - 2

定 价 69.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 目 录

引 言 传说中的夏、青铜与甲骨的商和文学的周 .....	(1)
第一章 文字：挽留瞬间即逝的声音 .....	(16)
第一节 小屯的发现、发掘与研究 .....	(17)
第二节 图画与声音的约会——甲骨文时代的文字艺术 .....	(23)
第三节 图画与思想——甲骨文的使用与功能研究 .....	(28)
第四节 渐变与突变——关于文字起源的思考 .....	(37)
第二章 青 铜 .....	(43)
第一节 青铜：器形与纹饰 .....	(47)
第二节 青铜：萨满式文明 .....	(56)
第三节 青铜：纹饰与神经心理学模式 .....	(63)
第三章 地上的、地下的和天上的：他们的宇宙 .....	(71)
第一节 他们的城市和他们的房屋 .....	(73)
第二节 他们的墓葬 .....	(96)
第四章 仪式与牺牲 .....	(109)
第一节 埋藏的意义 .....	(112)
第二节 作为牺牲的人与动物 .....	(117)

第三节	器物也是一种牺牲 .....	(124)
第四节	象征是宗教的流行语言 .....	(131)
第五章	享受文学的年代 .....	(138)
第一节	青铜上的《尚书》 .....	(140)
第二节	幸福的《诗经》与《诗经》的幸福 .....	(144)
第三节	史传散文 .....	(153)
第四节	大师语录 .....	(157)
第六章	方术与仙话：神话的尾声或回音 .....	(168)
第一节	方术与信仰的方术化 .....	(168)
第二节	仙话：世俗化了的神话 .....	(171)
参考文献	.....	(179)
后记	侈谈商周 .....	(187)



## 引言 传说中的夏、青铜与甲骨的商和文学的周

当传说时代(即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随着考古发现的日益增多和考古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清晰的时候,夏文化在我们的眼前仍然显得扑朔迷离。原因并不是考古发现比新石器时代要少,而恰恰在于司马迁的《史记》是把它当作信史来写的。就是说,夏代考古发现与信史的记载还不能相互印证。商代就不同了,大量的甲骨文和金文资料已经与《史记》等古籍“接上了头”<sup>①</sup>。

同商代相比,夏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与商之间的年代阶段——还没有发现像商代那样的文字资料,一些刻划符号并不比新石器时代要先进多少,青铜器的数量也十分有限。如此,就不能阻止一些人对它在历史上是否存在提出怀疑。所以,不少人更喜欢把大禹当作一个神话或是传说中的人物来理解,这样就没有风险。这样不是太负责,尤其对学者来说就更是如此。假如我们有一天站在绍兴涂山村的大禹陵前,或许也会有和站在西安秦始皇陵前同样的感觉:同始皇帝一样,大禹是一个人。不然的话,会稽山脚下的人民不会如此大兴土木,为一个不存在的人修造如此宏伟的生后住宅,除非后人把一种别的建筑或是别人的墓穴误认为是大禹的。至今仍生活在涂山村的、与大禹同姓似的百姓们肯定不会这样认为。如若这样认为,他们的姓氏甚至他们在此处的生活都会陷入一种意义的危机之中<sup>②</sup>。夏代是否存在与中国思

引

言

<sup>①</sup> 1917年,王国维先生发表了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将甲骨文卜辞同文献相比较发现,汉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商王世系是可信的。

<sup>②</sup> 孙庆伟先生认为,《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多条文献谈到葬禹,说明禹可能崩于巡守途中,就近而葬。详见孙庆伟:《鼎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第101页。



想史和艺术史撰写并非没有关系,而是关系重大。历史是思想史和艺术史写作不可或缺的背景,历史不清晰,思想史与艺术史就会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虽然漂亮但是很快人们就会找不到它的确切踪迹。

从学术上来说,有关夏代的考古研究是这样的。

由于殷墟的发现和确定,人们对寻找夏墟充满了信心。人们普遍认为,《史记·殷本纪》中商代历史尤其是商王的世系已为科学发掘所出土的地下文字资料所证实,说明司马迁对夏、商、周三代历史的记叙是较为认真和可靠的。那么,由此推理《史记·夏本纪》的夏代历史和夏王世系也极有可能是可信的。更有说服力的是,这个传说中的

夏代并不仅仅见于《史记》一本书,比它更早的《尚书》中有一篇《甘誓》,记载的是大禹的儿子启<sup>①</sup>征讨有扈氏的誓辞,由于誓辞的精彩,一直是夏人甚至商人世代相传的祖训。《尚书》中还有一些西周早期的文献,借周公等人的口多次提到夏亡的深刻教训<sup>②</sup>。这些文献资料都是言之凿凿的,要不是晚清开始兴起的疑古思潮对东周以前历史的否定,人们还没有想到这个夏代还需要考古发现的证实才能予以确认。

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徐旭升先生一直重视并关注古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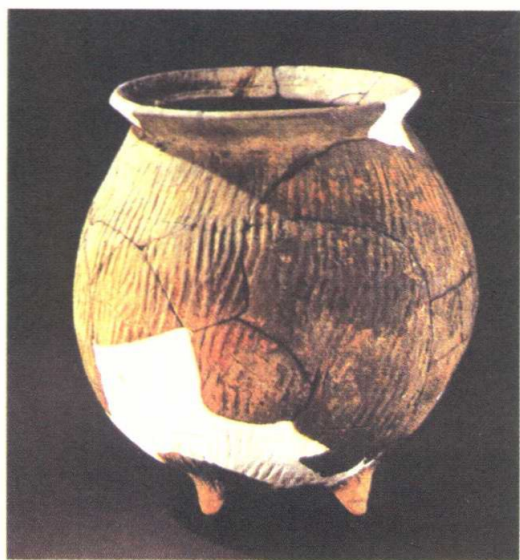


■ 在传说中,大禹是夏朝的建立者。图为山东嘉祥武梁祠汉代画像石上大禹形象。图片提供:朱卫华

① 一般认为,启是夏的第一任王。但也有人把大禹当作首任夏王,若按照这个顺序排列,启就是第二任夏王了。

② 如《尚书·召诰》,《尚书·多士》,《尚书·多方》,《尚书·立政》等。

传说与考古发现的关系。他在1941年完成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写道：“看春秋的时候，商人后裔，宋国的人可自称为商人或殷人，那夏人后裔，杞国或郑国的人就可以自称为夏后氏，有虞氏后裔，陈国的人也未始不可以自称为有虞氏。他们不惟可以自称虞、夏、商人，所用的礼俗制度在他们的中间一定也还有很大的差异。春秋及战国的人，耳目所及，就把它搜集起来，记录起来，也是一件很可以想得到的事。”<sup>①</sup>从他的这段话



■ 河南巩义北瑶湾村的花地嘴遗址出土的遗物为我们研究夏文化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证据，图为花地嘴的乳足陶鼎，图片来自《考古》，2005年第6期

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徐老对夏的真实存在充满信心。1959年，他带领一支考察队直奔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和山西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因为那里是传说中夏代城市最集中的地区。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引起了徐先生的特别关注。<sup>②</sup>据说，早在一年之前，即1958年，已经70岁高龄的徐老先生就已经来到了二里头所在的伊洛平原，凭着“伊洛竭而夏亡”这一条记载，徒步在伊洛平原上找来找去。这天在二里头，一个农民问他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他就说丢了一座城。于是农民把他领到了水塘边让他看塘壁，问他是不是他丢掉的城。徐老定睛一看，塘壁上布满了陶片。显然，这也是一个传说，一个考古界内的传说。凭感觉来说，这个故事虽然在细节上也许有演绎的成分，但大体上应该是可信的。然而，如果我们想用学术研究的

引

言

① 徐旭升：《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6页。

② 徐旭升：《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 河南安阳小屯殷墟遗址出土了15万片以上的甲骨，内容涉及商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如政治、社会、经济、宗教、科技文化、自然科学等。图为刻于商王帝乙或商辛六年的一块记事肋骨，一面刻有文字，另一面刻兽面、蝉纹、虺龙等纹饰，且嵌有绿松石。图片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华夏之路》（第一册），朝华出版社，1997年

标准把它研究清楚并予以证实，那么就会知道，它并不比证实夏代的存在要容易多少。从1960年开始，考古人员在那里做了连续不断的考古发掘工作，至今也未停止下来。人们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作坊、制骨作坊、绿松石器制作作坊、用于祭祀的建筑、400余座墓葬、纵横交错

的中心区道路网等。遗址出土了类似商青铜器那样的陶酒器组合、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发现约 250 处,已发掘的约 50 处,地点主要在豫中、豫西和晋西南<sup>①</sup>,分布地望与传说中的夏是吻合的,因此多数学者倾向于将它看作是夏文化。但由于文字等资料的缺乏,人们对于夏代与二里头的关系仍限于猜测。所以,从学术角度来说,夏文化的存在仍然是个假设。虽然“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代的年代估定为公元前 2070 年至公元前 1600 年<sup>②</sup>,在理论上这个数字的得出仍是基于上述的假设。也就是说,因为夏代是个假设的朝代,自然也是假设的年代。

考古工作队队长许宏先生强调二里头遗址作为都邑中心的复杂化与庞大化,并称之为“华夏第一王都”。作为二里头考古遗址的领导者,他不无自豪地说:“二里头文化发达程度,以及前所未有的强势辐射态势,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性文化。”但他仍然小心避开“夏文化”概念,体现了一位现代考古学者在研究态度上的严谨。因此他说:“目前的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研究的进展,尚不足以支持以夏王朝的史迹为核心内容的‘夏文化’以及‘夏代’的最终确立。”他完全从考古学情境出发,将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时代称为“二里头时代”而非“夏代”。<sup>③</sup> 美国考古学



■ 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酒器陶盃,高 20 厘米,器表呈浅灰色。这种颜色是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典型陶色。在青铜文化还未达到鼎盛的情况下,陶器仍然是高规格祭礼仪式中的主要用器。图片提供:许宏

引

言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研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82—86 页。

②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 ~ 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年,第 81—82 页。

③ 许宏:《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4—15 页。



家艾兰女士(Sarah Allan)也主张,传统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基本属于神话内容,因而不能作为复原夏代历史的可靠性证据,若是无同时代文字材料来作证据,这种历史复原是很难完成的。<sup>①</sup>

同夏代的考古发现相比,我们不得不说,商代是个奇迹,大量精美的青铜重器和如今分散收藏在世界各地大博物馆中的甲骨文刻片,奠定了商代文化在中国古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甲骨文的发现使中国的“信史”可以确切无疑地上溯至商代。这一点与夏代考古有着十分鲜明的区分。刻在龟甲和动物肩胛骨上的象形字都是用来记录商王在祭神仪式上占卜的结果,它们告诉我们,商代的人相信一个叫作“上帝”或“帝”的全能之神,这个全能之神下还有一些其他的神。正如学者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神权是商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与神权密切相关的祭祀活动是商代社会生活中经常性的活动。在商代文化中,我们今天称之为“艺术品”的那些东西大都与祭神有关,所以单纯地谈论所谓的“商代艺术”不可能让我们真正理解这些物质的含义。在研究艺术的同时必须考虑到艺术所借以产生的整个宗教神话的思想背景,因为“艺术、宇宙观和祭祀占卜等内容,它们都是一个底层结构上的产物,只有在整个体系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它们的含义”<sup>②</sup>。

结构主义人类学告诉我们,古代人的世界并不是由一件件器物所构成,这些器物也未必一定具有明确的具体特征,事物的本质并不蕴含在事物本身的内部,而是表现在它们之间所显示的结构上,这种结构需要我们运用适当的方法去理解和重建<sup>③</sup>。分析“艺术品”的含义必须关注人类行为的含义和行为含义的关系和结构,因此,在本书中,我们不会把叙述仅仅限制在器物的范围内,我们会探讨与之有关的结构和这种结构所寓含的符号化意义。

<sup>①</sup> [英]艾兰:《二里头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一种新的思维》,载荆志淳、唐际根、高嶋谦一编辑《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6页。但北京大学的孙庆伟先生则提出对夏代的考古学研究可以在历史学语境下展开,进而证明夏文化即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同时通过对史料中夏代社会结构的考察,对考古学材料做出新的判断。详见孙庆伟:《甯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针对以上争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的许倬云教授则提出一个较为折中的观点。他认为夏还谈不上是一个王朝,不过更有可能是一个绵延于黄河两岸的多国联盟。详见许倬云:《从新石器时代看中国古代文明核心的形成》,载荆志淳、唐际根、高嶋谦一编辑《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14页。

<sup>②</sup> 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汪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页。

<sup>③</sup> 陈淳:《考古学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3—145页。

毫无疑问,商代社会中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宗教信仰系统,它决定着商代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这个系统如此完善和强大,暗示我们在商代之前,甚至在新石器时代这个传统就已经存在了。商代的这个信仰系统是新石器传统的延续甚至是该传统在发展上的登峰造极,它统摄了商代人的社会生活——包括上至王族下至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早在距今9000年前的河南贾湖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刻有类似文字符号的龟甲,用龟甲占卜的风俗也一直在后来的大汶口、凌家滩等文化中流传。同时,新石器时代许多文化中也有占卜用兽骨的发现,这样的传统在商代呈爆炸性出现,大量的刻辞龟甲、兽骨意味着宗教仪式的频繁举行并具有了一种日常性,因此占据了人们的主要精力和时间。青铜器同甲骨文一样,也在这一时期呈爆发式出现,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精美程度上都是中国其他任何历史时期所无法相比的。最早的青铜器目前发现于仰韶文化,一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有零星的发现,相当于夏代时期的青铜器技术虽然较新石器时代有了不小的起步,但仍然未能脱离原始的形态,做工同商代相比则显得简单和粗陋。商代青铜器出土的数量是令人震惊的,我们很难计算出来当时商王集中了多少人力与物力专门用于青铜器制造,但一定是耗费巨大。大量的食器和酒器是作为礼器使用的,用于祭祀。这只有一个强大的富裕的王国才可以做到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有着完善的国家特征,整个族群或者说是整个国家对神的系统的崇拜,使人际关系中的等级制度并不明显,因为以青铜为代表的财物在实质上并不归属于个人而是归属于一个祭祀系统。能够看到的是,这个庞大的王国在制度上仍然具有与王国的庞大所不匹配的原始特征。



■ 据一些专家考证,商代的社会组织并未摆脱纯朴的原始特性。图为河南郑州商城出土的陶尊。图片来自《中国文物定级图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



■ 利簋是目前有准确记时的西周最早的一件青铜器，发现于陕西临潼县的一个西周铜器窖穴中。器底刻4行32字，明确记叙了周武王伐商的史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中，利簋还被当作了重要的断代依据。图为利簋和铭文拓片，图片和拓片来自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编《文物藏品定级标准图例铜器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

正如某些学者所论述的那样，商代的社会结构是一种方国联盟制。<sup>①</sup>从卜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商王常常与一些方国联合起来去征伐另外一些方国，正说明了商王朝的方国联盟性质——商王不过是方国联盟的盟主而已<sup>②</sup>。商王朝的臣属都是方国部族的首长，常常带领自己的部族成员为商王服务。其军队并无固定的建制，有战争时便临时从部族中征集兵士。商王的诸子在选立为储君之前与其他王子及平民无异，说明商代尚没有特殊的贵族阶级，因此还谈不上是等级社会。商王与方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盟主与诸侯的平等关系。商代官制简单，没有等级制度，但为什么能够控制如此广大的方国部族社会呢？其所依赖的统治方式正是神权，正如陈梦家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商王既为政治领袖也为群巫之长<sup>③</sup>。如果比较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Elman R. Service)的游团(Bands)——部落(Tribes)——酋邦(Chieftdoms)——国家(States)四阶段演进学说，商代政权由于缺乏强制性的约束力，即没有固

① 林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载《古文字研究》第六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② 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5页。

③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1936年第20期。



■ 商代社会中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宗教信仰系统，它决定着商代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它统摄了商代人的社会生活——包括上至王族下至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图为商人祭祀祖先的想象复原图。图片来自刘炜主编《中华文明传真（2）》，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

定的军队，还不具有典型的国家特征，它的社会形态更与酋邦接近，尽管它的规模已经与一个帝国无异。在塞维斯看来，酋邦社会权力结构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权威，它以阶等为基础，并不建构在强制性的暴力之上。同游团和部落相比，它创造了更高水平的宗教结构，并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酋邦社会名义上的统治者其实是神而不是人，神又常常与祖先相混淆，就是说，神往往是祖先，祖先也是神。商代人的上帝有时是居住在天上的全能之神，有时又是逝去的先王，这一点与酋邦的形态是吻合的。用塞维斯在《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中的原话来说是这样的：“酋邦拥有集中的管理（centralized direction），具有贵族物质世袭的等级地位安排，但是没有正式的、合法的暴力镇压工具。组织似乎普遍是神权性质的，对权威的服从是一种宗教会众对祭司——首领的服从。”还有一段话，概括了酋邦社会的基本特征：“大体上说，酋邦是家庭式的，但是不平等；它没有政府，但是拥有权威与集中的管理；它没有资源上的私有财产或者经营性质的市场贸易，但是在与物品与生产的掌控方面却是不平等的；它有阶等区分，但是没有明显的社会经济阶级或者政

治阶级。”<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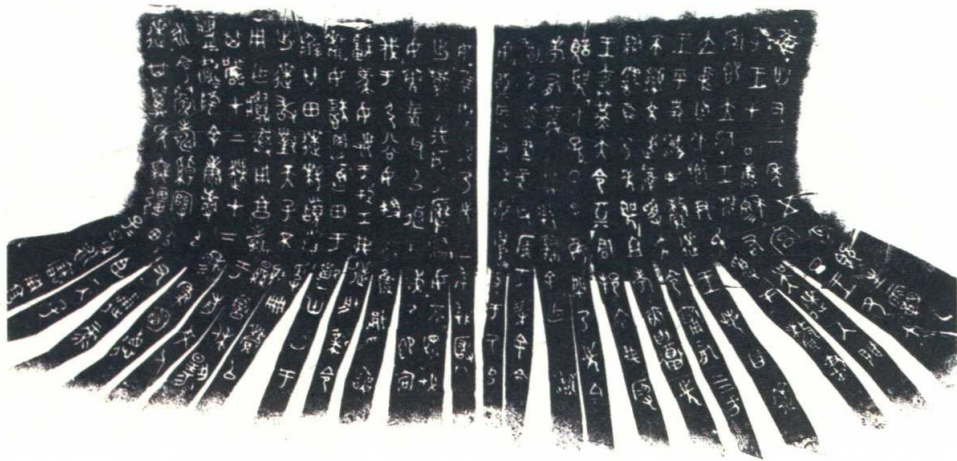
青铜与文字的婚礼  
夏商周神话、艺术与思想



■ 与夏商的首邦（方国）联盟制不同，周王封建子弟为诸侯大藩，由一姓统治的新的国家模式与政体产生，并因此具有了中央集权特点。据记载，周初共分封了 71 个侯国，在后来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鲁、齐、燕、晋、卫均是当时较大的封国。图片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华夏之路》（第一册），朝华出版社，1997 年

<sup>①</sup> 以上有关塞维斯首邦理论的引述，请参阅易建平：《塞维斯的首邦学说及其相关文化演进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年。

塞维斯所说的“政府”是指一种具有强制性的合法的政权组织,显然商代的政权还不具备这样的特征。因此,商代的政权更接近于一种家族式的管理,更像是一个被数倍扩大化了的酋邦,商王实际上是一个领导整个王国人民去敬拜上帝的带头人。从卜辞上可以看到,殷王率领着庞大的占卜集团,几乎是年年、月月、日日在祭祀上帝,以及祖先鬼神和自然神祇。商的开国之君成汤因为天下大旱,五年不收,便要以自己的身体为牺牲自焚向上帝求雨,这在《吕氏春秋》中有着较为清晰的记载。上古的中国有着焚巫求雨的宗教祭仪。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商王既是领袖同时也是群巫之长。好在天不亡商,也许是心诚则灵,未等焚身大雨已至。



■ 长篇青铜器铭文在西周大量出现,内容多与赏赐、征战、训诰等有关,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已经具有了文学意味。图为出土于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窖藏的一件铜鼎铭文,内壁有铭文25行,共280字。图片来自《文物》,2003年第6期

以神为本的神权政治使商的社会组织未能摆脱一种纯朴的史前特性。徐中舒先生认为殷人的社会结构其实仍然处于部族组织阶段<sup>①</sup>。陕西师范大学的王晖教授认为,商代是诸侯部族联盟体社会,商王与方国之间的关系是盟主与诸侯之间的平等关系。如:战争或狩猎时,卜辞中常用“比”字表达商王与其他诸侯酋邦之间的关系是并列平等的。<sup>②</sup> 赵诚先生从对甲骨文内容的分析中得出了更清楚的结论,认为商与周在社会组织上最大的不同是,商王

①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83—84页。

② 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8页。



朝是在商方的基础上经过联合形成的国家。这个时期的方国,是原先就已经存在的方国,并非是由商王册封的,所以这些方国有时与商为友,有时又与商为敌。而周王朝的统治权则集中在周王的手中,所有的诸侯国是由周天子分封和认可的,二者在本质上有着天壤之别。商王只是方国联合体的领袖,而周王则是封建诸侯国的天子。<sup>①</sup>

发现于河南小屯殷墟的甲骨文字让人们确信商代已经进入了历史时代,史前文化似乎离商人已很遥远。从世界范围来说,考古学界一般把系统的文字和历史记载出现以前的时代称作史前,之后称为历史时代。比如西北欧洲,当人类已经进入铁器时代而文字尚未被人们使用,直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占领了这一地区才带来了成熟的文字使用系统和历史记载方式。因此,西北欧洲在公元前1世纪以前被划分为史前,之后属于历史时代。然而,在中国,实际上最早记载人类活动的文献始于周代<sup>②</sup>,虽然商代已有大量的甲骨文发现,也已经证明商代存在着十分成熟的文字系统,但是甲骨文的使用范围却是有限的——它仅仅被用来记录占卜,考古发现尚未显露出商代文字的使用超出祭祀以外的情形。就是说,商代的文字还并不具备后世的记述人类活动的功能。我们可以说商代已经文字化了,但是甲骨文毕竟不是文献(或文学)<sup>③</sup>。甲骨文说明,商代人仍如夏之前和夏代的中国人一样在神话思维中思想,而不是像周代以后的人那样在历史思维中思考着神话。从这一点上来说,商代并不是典型的历史时代,如果把夏商看作是中国史前时代的延续,也并非无道理可言。

周代就不一样了,如果说商代是一个神权至上、以神为本的社会,那么周就是一个民神并重且以民为本的社会。因此,学术上一般认为,商周

<sup>①</sup> 赵诚:《甲骨文与商代文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页。唐际根先生认为,商代国家结构以“内服外服制”为特点。商王直接控制的王畿地区属于“内服”,而诸侯与众多的方国组成了国家的“外服”。详见唐际根:《殷墟:一个王朝的背影》,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0页。

<sup>②</sup> 据说,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献应是《尚书》,如其中《多士》篇就被认定是西周早期的文献。目前,周代的文献里尚没有商代逸文的证据。商代的青铜器铭文均很简单,往往只有简单的祖先献词。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明显增长,内容与歌颂、赏赐、训导有关,语言特点与《尚书》中早期篇章接近,似乎意味着早期的文献传统是从青铜器铭文发展而来的。

<sup>③</sup> 蔡先金先生与刘昕女士通过对甲骨卜辞内容研究认为,卜辞实际上“在神话故事、诗歌属性、文体结构、叙事方式、人物塑造、世界描绘、传播接受等方面已经具有一定意义的文学属性”。详见蔡先金、刘昕:《从文学史的角度:甲骨卜辞透视》,《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9期,第154页。